



中外出版史

ZHONGWAI
CHUBANSHI

肖东发 于文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1 世纪编辑出版学系列教材

中外出版史

肖东发 于文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外出版史/肖东发, 于文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21 世纪编辑出版学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10691-5

I. 中…
II. ①肖…②于…
III. 出版工作-文化史-世界-教材
IV. G23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5002 号

21 世纪编辑出版学系列教材

中外出版史

肖东发 于 文 主编
Zhongwai Chubansh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170mm×228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20.75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65 000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经过几十年的艰辛探索，我国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国家软实力的综合体现。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出版业，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承担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出版业肩负着传播知识、传承文化、创新理论、教化育人、服务社会等重任，理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当前中国出版业发展有两大趋势：一是随着出版的国际化、产业化和市场化，出版社的经营管理成为核心；二是随着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在出版中的广泛应用，出版业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出版业作为内容提供商和服务商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出版业在内容采集、集成、传播和服务等方面对从业人员信息技术的能力有较高的要求。这两个方面都对我国现有的出版编辑和经营模式以及人才培养模式提出新的挑战，我们必须以更高的起点和全新的视角来规划编辑出版内容，完善和优化编辑出版人才培养方式。

编辑出版专业自1985年设立以来，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据统计，迄今已经有100多所学校开设了这个专业，为社会和整个出版行业培养了大批人才。编辑出版专业属于为行业服务的应用型专业，这个专业教育质量的高低，既取决于课程设置、师资队伍、教材建设等，也取决

于其所学内容是否能够为行业发展服务。而在这两个方面，教材建设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目前，编辑出版专业教材的出版状况相比于 20 世纪 90 年代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国内已经有若干套编辑出版专业的教材，在这些教材建设中，出版社的经营管理问题以及现代电子技术在出版中的应用问题占了一定的分量和比例，但传统的编辑课程仍然占据绝对优势的比例，能够反映上述出版业发展两大趋势的教材的水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对国内高校编辑出版专业开设课程情况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学科发展趋势，编写了这套“21 世纪编辑出版学系列教材”，首批书目包括编辑出版学概论、编辑出版史、编辑实用写作、出版管理学、出版营销学、电子与网络出版、版权法与版权贸易等内容。丛书定位于本科教材，既顾及了编辑出版专业传统的基础内容，又紧跟编辑出版专业的发展趋势，满足了在出版教育中强化经营管理和信息技术方面的需要。同时，本套教材约请了一些既有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实践经验，又在编辑出版专业一线从事教学的教师参加编写，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力争既有理论深度，又能够紧密联系编辑出版实践，同时引入一些教学案例，令读者能够学以致用。

这套教材的编辑出版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教务处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也得到国内很多专家学者的鼎力协助。希望本丛书能对编辑出版专业的教育发展和时下面临深刻变革与重大转型的出版界有所帮助。同时，也希望广大编辑出版专业的师生以及出版界同仁对丛书的不足之处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使这套教材能够不断修订和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6 月

前言

出版作为一项文化传播活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和发展，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在这段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同的民族和国家既有多姿多彩、风格各异的出版形态，又有惊人相似、殊途同归的演变历程，更有彼此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历史。因此，可以说包括中国和外国两个方面的出版史整体研究是非常必要的。首先，出版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回答诸如出版的本质、出版的基本规律等本源性的问题。而只有进行涵盖古今中外各个维度的比较与考察，出版史研究才能全面而深入，从而获得真理性和一般性的认识，这是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其次，我国出版业发展的现状也要求加强中外出版史的整体研究。因为当前我国大力发展的现代出版产业并不是在封闭的状况下仅仅由传统出版业内在演化而成的，而是按照现代出版产业的基本特征和要求来推进的。我国的出版改革既有历史传统的传承，更伴随着外国出版业的制度移植与观念渗透。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出版产业起源于西方，对于西方出版史的研究，能使我们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研究现代出版产业的本质与规律。

由此可见，中外出版史的研究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而作为编辑出版学核心骨干课程的“出版史”更应该是涵盖中外的出版史。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外国出版史研究的开拓者就已经有相关译著和教材问世，但当前

国内出版史教材仍多为中国出版史，而已有的中外出版史著作也较为单薄且缺乏体系。为此，我们感到有必要编写一本中外出版史的教材来弥补这一缺憾。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力图对本书中中国出版史和外国出版史上下两篇都有所创新，希望不仅能使中外出版史更好地融合于一书，还能清晰地展现中外出版史的发展规律，有助于读者比较和思考。

因此，在教材的框架结构方面，上篇“中国出版史”没有采用按历史朝代进行断代分期的通常做法，而是采用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大分期，为的就是更好地和外国出版史衔接。而中国古代出版史部分则以造纸术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为界限，划分为简牍时代、写本时代和印本时代三个历史分期，这就进一步消解了朝代政治分期的羁绊，以出版业自身的发展阶段为分期来展现中国古代出版的历史。其实，以技术形态来作为出版史分期的做法恰恰体现了出版史的学科独立性和独有的学科特色。

本书的下篇“外国出版史”最能体现本教材的新意所在，其编撰过程也颇具实验性的探索。外国出版史可谓横跨五大洲、纵贯五千年，如果我们对各国的出版历史逐一介绍，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此，我们尝试以英、美、法、德、日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出版历史作为主要史料来源，打破国别界限，不拘泥于细枝末节，力图勾勒出外国图书出版业千年发展的主要线索和基本规律，这一点也与我们研究外国出版史的主要目的相吻合。故而，在框架结构方面，我们结合国外出版史研究的学科传统和外国出版史的整体特点，将外国出版史按照出版业的发展水平和特点划分为古代出版史、中世纪出版史、近代出版业和现代出版业四个大的历史分期。这样做的意图就是给本书读者以整体的出版史观，展现出版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和阶段性的演变规律。这四个历史分期正好又以羊皮纸的应用、谷登堡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第一次工业革命三个标志性事件作为界限，也充分体现了出版业与社会发展相交织的特点。在章节的内容编排方面，外国出版史的每一章都按照社会文化背景、出版宏观管理、出版业形态与制度、图书发行与贸易和图书的形式制度等几个方面分节展开，从而达到纵横有序的效果，将出版业生产、发行等诸方面的历史发展脉络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

出版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出版史永恒的主题，也是本教材的重点着墨之处。从图书出版在春秋战国和古希腊罗马的辉煌初现，到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中国近现代的革命斗争，社会文化的发展在不断地塑造和改变着出版业的产业形态，并为其提供发展助力和成长机遇；而反过来，图书出版业的技术革命和制度变迁又一次次地成为历史进步的推手，并频繁地扮演着关键角色。本教材的编

写正是力图将出版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作为中外出版史的一条思想主线贯穿其中，从而拓展了出版史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展现了出版史所应有的学科魅力。

本书的框架结构和写作大纲由肖东发设计和拟定。其中上篇“中国出版史”部分由肖东发、杨虎和肖莎合作完成。下篇“外国出版史”部分，鉴于外国出版史史料与参考文献的国别属性特别强，除第六章“外国古代出版史”和第七章“外国中世纪出版史”由于文独立编著外，外国近现代出版史部分首先由多人分国别撰写初稿，其中于文撰写英国部分和德国部分，诸葛蔚东撰写日本部分，李武撰写美国部分，闻新芳撰写法国部分，帅震撰写澳大利亚部分，最后由于文按照时间线索和横向系统重新组织，完成外国近现代出版史部分的编写。在校对过程中，商西、肖阳做了不少工作，在此顺致谢意。

中外出版史的研究是一项非常庞大而系统的工程，尤其是外国出版史更是纷繁庞杂、浩如烟海，需要长时间的学科积淀。尽管国内关于外国出版史的研究成果尚甚为单薄，我们仍不惧浅显，推出这本中外出版史的教材，为的就是抛砖引玉，借此推动国内对于中外出版史特别是外国出版史的教学和研究。因此，本教材的出版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的工作更加繁重和迫切。具体而言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外国出版史研究的内化和外延：一方面，在系统、详尽地占有史料的同时加强内化，本教材已完成基本线索的梳理，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问题、分析特点、总结规律。另一方面加强出版社会史、出版经济史和出版文化史的研究，拓展外国出版史的研究外延，增强出版史研究的生命力和吸引力。此外，我们还需要通过对外国出版史的学习，促进与各国出版史学界进行研究方法的交流，吸收和借鉴国外研究者在出版史研究中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

这部教材只是初步的尝试，是否能达到我们期望的目标，还得由读者评判。我们不仅希望本书能继续修订完善，将研究进行下去，更希望能看到有更多更好的中外出版史研究著作不断问世，形成中国出版史与外国出版史并举的学术新气象。限于时间和水平，本书的纰漏贻误在所难免，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编者

上篇 中国出版史

第一章 古代出版（上）：竹木简牍时代（上古—1 世纪）	3
第一节 文字的产生及图书的起源	3
第二节 上古至西汉的图书出版业	11
第二章 古代出版（中）：写本书时代（2—9 世纪）	17
第一节 纸的发明与造纸术的外传	17
第二节 写本书的发展及普及	20
第三节 写本书时代的图书出版业	24
第三章 古代出版（下）：印本书时代（10 世纪—1840 年）	32
第一节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32
第二节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	38
第三节 套版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	44
第四节 印本书时代的图书出版业	47
第四章 近代出版：变革与发展共存（1840—1911 年）	92
第一节 近代出版业的十大变革	92
第二节 近代出版业发展概况	101

第三节 近代出版的社会作用	114
第五章 现代出版：在斗争中前行（1912—1949 年）	117
第一节 现代出版业发展概述	118
第二节 现代民营出版业的发展	121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图书出版活动	132

下篇 外国出版史

第六章 外国古代出版史（史前—5 世纪）	153
第一节 出版的萌芽：原始书籍和书写文化的诞生	153
第二节 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图书出版	161
第七章 外国中世纪出版史（6—15 世纪）	177
第一节 中世纪的社会文化背景	177
第二节 中世纪的出版机构和编辑出版活动	183
第三节 中世纪的图书形制	189
第四节 造纸术和印刷术在西方的早期发展	192
第八章 外国近代出版业（16—18 世纪）	200
第一节 近代外国出版业的社会文化背景	200
第二节 近代外国统治者的出版监管制度	204
第三节 近代外国出版业的演变与发展	209
第四节 近代外国的图书发行	224
第九章 外国现代出版业（上）（19 世纪）	231
第一节 19 世纪外国出版业的社会文化背景	231
第二节 19 世纪的图书出版业	238
第三节 19 世纪的图书发行业	255
第四节 19 世纪印刷技术的发展	262
第十章 外国现代出版业（下）（20 世纪）	269
第一节 20 世纪外国出版业的社会文化背景	269
第二节 20 世纪外国出版业管理	274
第三节 20 世纪的外国出版业	281
第四节 20 世纪的外国图书发行业	300
第五节 信息技术革命中的出版业	308
参考文献	314

中国出版史

上篇

中國出版史

在遠東的歷史進程中，不同的民族和國家發展着不同的文化。中國出版史是中國文化史的一部分。出版史的研究，不僅是為了了解中國的出版事業，更是為了理解中國文化的演變。出版史的研究，需要從多個角度出發，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只有這樣，才能全面地認識中國出版的歷史。

第一章

古代出版（上）：竹木简牍时代 （上古—1 世纪）

【本章要点】

文字的出现推动中国出版业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本章从文字的产生讲起，进而细述了目前业界关于图书起源的五种说法，并分别介绍了早期的文字载体，尤其是纸普及使用之前的主要载体——竹木简牍。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被少数人保存和垄断的现象逐渐被打破，私学开始发展，进而推动了学术文化的普及和文化思潮的发展，著书立说之风兴起，图书的收藏和整理活动也渐渐增多，图书贸易初见端倪。

信息、文字、载体是构成图书的基本元素，在这三个要素的基础上辅之以基本的生产技术和工艺以及必要的装帧形式，图书才得以产生。造纸术发明之前，图书的载体主要为竹帛，图书形制为简牍制。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出版的竹木简牍时代。

第一节 文字的产生及图书的起源

一、文字的产生

文字的出现拓宽了人们传递信息和交流思想的方式，

使人际交流和群体交流更加便捷，同时也使得人类优秀的文化传统得以流传后世。

文字的出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据人类学家研究，在文字没有产生之前，人们交流信息和表达思想经过了“有声无言”和“有言无文”两个很漫长的时期。在“有声无言”阶段，人们只能靠声音或动作来表达感情，与其他动物并没有很大的区别。以后逐渐进化，可以利用口中发出的不同的声音来表达感情，开始出现了语言。有了语言，人与人之间便可以互相对话、沟通思想、交流经验。此时，文字还没有出现，人类还处在“有言无文”时期。语言出现以后，在语言和实物的基础上，又经结绳记事、契刻和图画三个阶段，文字才得以产生。

关于文字的产生有很多传说，最常见的是仓颉造字。许多古代文献中都有仓颉造字的记载。如《韩非子》、《淮南子》、《说文解字》等书中都认为上古黄帝时代的史官仓颉创造了文字，说得最为具体的当数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序》：

黄帝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义，万品以察，盖取诸夬。

.....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寔多也。着于竹帛谓之书。

这段文字不仅说明了仓颉所处的时代及其所任职务、受何启示而创造文字，还回答了他发明文字的方法和步骤，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文”、“字”、“书”这几个基本概念的认识及所下的定义，同时也说明了文字书契产生后的意义和作用。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如前所述，文字的出现，是人类从野蛮时期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古人在长期劳动实践过程中逐步创造的，它是集体经验积累的结果，绝不可能是一人一时的功劳。

而关于文字产生的年代，学界现在也未有定论。我们只能依据社会历史背景，以不断发现的地下文化遗物为证加以推测。但距今3400年前的殷商甲骨文已是十分系统、发展成熟的文字，它显然不是我国最早的文字，这一点是比较肯定的。1988年，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内，出土了一批甲骨，其上所刻的符号，个别的形体与河南殷墟甲骨文的某些字形相似，似应一脉相承，据碳-14法测定，并以树轮校正，这批甲骨的时代距今约8000年。也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文字。相信随着考古的发现，文字出现的脉络也将会越来越清楚。

二、图书的起源

我国图书最早出现于何时,现在很难做出比较准确的结论。目前存在的说法有五种:河图洛书说、伏羲产生说、夏代产生说、殷商产生说、春秋末年产生说。

(一) 河图洛书说

“河图洛书”是一个传说。中国最早的古籍《易经》就有“河出图、洛出书”的记载。另一部古籍《尚书》中也有同样的说法。有人进一步解释说:伏羲统治天下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羲根据这种“图”和“书”画成八卦,就是后来《周易》的来源。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河图》、《洛书》,是由一系列神秘符号所组成的数字方阵。它们是经过周、秦、汉几代儒生方士之手加工后的形态,其原始面貌已无法知晓了。有人认为它是古代游牧民族所画的立体的天象图;还有人认为它是由自然界的天然痕迹——龟甲发展而成的抽象符号,是中国第一部图书,并认为《河图》与《洛书》在中华文明史上曾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但传说和神话并不是历史,它是历史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启示:在文字发明以前,就先有了图画和一些简单的符号作为传播信息的工具;我国文明的最早发生之地是在黄河、洛水一带的中原地区。

(二) 伏羲产生说

关于伏羲造书的传说,多种史籍都有记载。唐代的司马贞在补《史记·三皇本纪》中记载:

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俚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戏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黄河流域远古社会从野蛮进入文明的具体情景。“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标志着伏羲时代人们已开始创制文字、制造文书,准备接受文明的洗礼,告别结绳记事的历史。

伏羲造书的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远古时代的现实。但这毕竟只是一个传说，还缺乏科学依据。

(三) 夏代产生说

我国书籍最早出现于何时，现在很难做出较准确的结论。因为并非有了文字就形成图书，这也需要很长的一段历史过程。我们至今尚未发现夏朝的文字和文献实物，但根据其他文献判断分析，我们还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在夏这一历史时期即公元前 21 世纪至公元前 16 世纪，完成了由文字到文献典籍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其论据如下：

(1)《史记》和《竹书纪年》都载有夏代帝王的世系表，尽管两者的记载不尽相同，但大同小异。这说明两者是以同一份原始文献记录为依据的。而且，在殷墟甲骨文发现后，王国维据卜辞中殷商的先公先王世系考证出《史记》中《三代世表》是“信史”，因为夏代诸王与商先王刚好是同时代的人，都在距今 4 000 年左右。

(2)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多士》中有这样一段人们经常引用的文字：“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是武王灭商后，周公对殷商贵族的训话，大意是：你们殷的先人，在推翻夏朝时已有典籍记载了这段史实。说明夏商更迭之际已有典册。

(3)据古籍记载，夏代典籍有《夏书》、《夏时》等，《左传》、《国语》、《墨子》等多次提到《夏书》并引其文。如《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保留了我国最早的日食记载，可见《夏书》在春秋战国时还流行于官府与诸子之中，可惜今已亡佚，只有《甘誓》篇被认定为夏代留存下来的文献。我们可以从先秦及后世典籍中，间接了解一些夏代文献的名称。如《孟子·梁惠王下》提到《夏谚》，《左传·昭公六年》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史记·夏本纪》记夏禹时作乐《箫韶》，启时作《甘誓》，太康时作《五子之歌》，仲康时作《胤征》等。

(4)夏代已总结出天文历法和农业知识。上古时期，人们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总结并掌握了一定的天文历法知识，以 12 个月为一年，有大小月之分，大月 30 天，小月 29 天，还懂得了 19 年置 7 个闰年。夏代的历法称“夏历”。夏历以寅月为岁首，不同于殷历和周历。春秋时，孔子曾主张“行夏之时”，我们至今所使用的农历，基本上是夏历。

(5)有关夏末地震和陨石的文字记录。在《竹书纪年》和《世本》等古书中，有“夏发七年，泰山振”、“夏桀十年，夜中星陨如雨”等记载，是世界上关

于地震和陨石雨较早的一批文字记录,可作为夏代末年有文献记录的旁证。

(6) 夏末有太史和典籍等文献记载。《吕氏春秋·先识览》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这段文字明确告诉我们,夏王朝不但有图法,即图书法令,而且还设立了专门负责收藏、保管这些图书典籍的官员——太史令,终古捧出政府要典,对昏聩的夏桀哭谏,桀王执迷不悟,更加残暴淫乱。于是太史终古投奔商王。《吕氏春秋》写成之后,曾公布于咸阳市门,声称能增删一字者,赏予千金。可见这段史料的来源不会毫无根据。

在《国语》、《战国策》、《逸周书》、《穆天子传》、《礼记》等著作中都或多或少地保存着夏王朝的资料,如《国语·晋语》载:晋文公时,“阳人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所以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著《史通》时,也把这段史料作为夏王朝有书有史的论据。

(7) 殷墟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据《甲骨文编》等资料统计,甲骨文所使用的单字数量有四五千个,总字数以百万计,这么庞大的数量和规模以及完备程度说明它一定经过了比较长期的发展。

(四) 殷商产生说

持此种观点的人认为书籍产生于殷商时期,理由是这一时期出现了掌管图书的人员——史官。

我国古代把掌管文字记录的专职人员通称为“史”。“史”是一个象形字,象征右手持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经常出现。至于所持为何物,则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这些解释有一共同点,就是都与文字和图书有关。史官受雇于诸侯,负责起草册命和记录史实。很多金文和古籍中常有一个公式化的句子:“王若曰——”,就是说,这些文件不是王自己写的,而是史官受命而作。史官既要记录帝王言行和军国大事,又要负责管理政府的各种档案图籍,还要从事宗教事务,负责占卜、祭祀等迷信活动。因此,他们身边积累了大量档案文书资料,他们是当时最博学的人,修史重任自然落在他们身上。有了史官,自然也就产生了图书。

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我们不能以掌管图书之人的出现时间,来作为图书产生的时间,两者是不同的。图书的产生应该早于掌管书籍的史的产生,没有书籍,何来史官?

(五) 春秋末年产生说

还有的学者认为图书产生于春秋末年,因为在这一时期,官学衰落,私学兴